胡容芳電視台訪談錄

茲錄胡容芳的電視訪問全文如下：

1，胡先生，你是怎麽樣參加職工會運動的？

答：我是在一九五九年成爲新加坡商行僱員聯合會Hagemeyer分會的會員，那時我眞誠地相信工人要得到更好的待遇和改善工友的工作情況，最好的保障是參加職工會。

2，你在各職工會里担任了些甚麽職務？

答：我在一九五九年被選爲新加坡商行僱員聯合會Hagemeyer分會的秘書。一九六〇年我被選爲聯合會的主席。我担任這個職位一直到工會在一九六三年被政府取消註冊爲止。在一九六一年我被選爲S.A.T.U.的籌備委員會主席。

3，你參加職工會有什麽政治的動機嗎？

答：沒有，我的主要動機是爲工友尋求更好的待遇和改善工作情况。

4，爲什麽你所加入的職工會牽涉到比較多的政治活動呢？

答：新加坡商行僱員聯合會的牽涉到政治活動，是從我們開始邀請親共職工領袖做爲我們的顧問起的。這些人把我們捲入政治漩渦。他們在外表上看起來是關心我們的福利，而事實上他們是爲了政治目的。

5，你到底怎麽樣邀請親共領袖做爲新加坡商行僱員聯合會的顧問呢？

答：在一九五九年當我們自己處理職工會的時候，我們遇到許多困難。其中最重要的是工業糾紛談判。我們欽佩左翼工團處理他們的事務，就以爲如果得到他們的幫助，便能更順利地處理我們的事務。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找兀哈爾作爲我們職工會的顧問。在這裏必須指出的是兀哈爾那時是政府的政治秘書，我們以爲有了他的帮忙，我們就更容易做事。普都遮里和兀哈爾有密切的關係，雖然我們沒有請他，他却自己來帮忙。爲了表示我們對他的感謝，在一九六〇年六月舉行的常年大會中，我們聘他爲工會顧問。兀哈爾和普都遮里表現出他們的熱心，漸漸地得到我們的尊敬和信任，那時他們開始操縱我們。他們提議說，解決工業糾紛最好的武器是「罷工」。工會接受他們的勸告，號召了幾次「罷工」，「怠工」使他們更有工好做，他們看起來也很賣力，就提議應該聘請更多的受薪秘書來協助他們。我們同意，由他們介紹，我們請了林使實和Kam，這兩位也是親共職工領袖。我們聘請這些人是因爲我們已經慣於讓他們替我們處理工會事務，而使我們自己對於工業糾紛談判變成脫了節。後果便是兩名顧問和兩名受薪秘書實際上是替我們處理工會事務。

6，這些顧問給了你們什麽意見？

答：他們一旦獲得我們的信任，就很容易使我們相信政府是採取反勞工政策，他們舉了職工總會被解散作爲例子。我們一旦接受這個論點，他們以後所說的意見，我們也接受了。關於工業糾紛，他們說，要有結果，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採取怠工行動。他們替我們擬好了新的談判政策。他們說：我們舊的談判政策是導致多數談判失敗的原因。他們還說，我們過去的聯合談判政策是不好的政策，因爲經理部可以互相支持來防止工會的要求。他們提議說，如果分別談判，工會便能够容易地迫使經理部接受要求條件，因爲分別談判，經理部便不能得到支持。他們說除此以外，他們還可以把談判安排到經理部非接受我們的要求不可。雖然我不明白他們所要採取的談判方法，我們也沒有什麽疑問，因爲他們的解釋使我相當感動。我那時是要很快的得到結果，至於他們怎麽做，我就不管那麽多了。

7，你能不能想起他們對新加坡商行僱員聯合會的勸告是什麽，以及對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工運有什麽影響？

答：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一段時期，我們的工會顧問是兀哈爾和普都遮里，受新秘書是林使資和Kam，他們另一名左翼職工領袖。由於他們的勸告，只要經理部稍微觸怒我們或冷淡對我們，我們便決定怠工，雖然大多數談判而導致怠工，是於眞正的工業糾紛，但是也有一些並不是眞正的工業糾紛，例如，在羅敏申公司的怠工並非由於工業糾紛。那是由於很小的一個問題而引起的，有些女工不滿歐籍董事經理而覺得受虐待。她們要求公司革除該名董事經理。當公司不讓步時，分會便擅自進行罷工。普都遮里和兀哈爾介入這個事件而堅決要新加坡商行僱員聯合會支持這不分是非的罷工。他們這樣做是爲了政治理由，因爲並沒有罷工行動的需要。同樣的，在Guthries公司的怠工，也沒預先得到總會的核准，可是我們的顧問，兀哈爾和普都遮里，却祝賀怠工行動，又鼓動工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贊同罷工。很明顯的，工會顧問支持罷工是爲了他們自己的動機。在Roneo公司的事件中，我們的顧問認爲怠工是使工會能希望獲取效果的唯一方法。他們說，政府是反勞工的，政府只要操縱對工會不利的工業談判。我們的顧問除了爲他們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操縱工會之外，還使工會參加非工團的積極任務，例如由中華總商會所號召，在大草場舉行的血債大集會。他們也支持南大生鼓動反對政府。我們顧問的所做所爲，都是爲了他們的政治動機。至於血債大集會，我們的顧問說服我們道，政府是爲了自己目的在利用這問題。結果在大草場的集會中我們發生了蠻橫的抗議和退出集會。當南大生在南大校園鼓動反政府時，我們的顧問促使工會會員以安慰訪問的方式給南大生道義上的支持。

8，你們的工會牽涉到政治，你的反應如何？

答：起先是不知不覺的，後來變成自願的，我贊同工會牽涉到政治，因爲這時我受警方逮捕，被判坐監而不能罰欵代替。我很氣政府。由於顧問的煽動，我相信政府在注意我們的工會。爲了挽救工會被取消註冊，我竭盡所能，反對政府。

9，王淸杉最近被釋放，在一項電視訪問中，他迪說社陣控制新加坡廠商工友聯合會的經過。關於這件事你知道一些什麽嗎？

答：知道。新加坡廠商工友聯合會的控制權之爭是發生在一九六六年。那時工會的秘書來請教我，由於他恐怕工會裏那些受英文教育者將不復存在，因爲得不到受華文教育者的支持，受華文教育者在工會是佔多數。他向我揭露說，工會里的受華文教育者已分裂，有些支持當時工會的主席，有些是親社陣主席。當時工會主席由於某項政治問題和社陣主席爭論過而不受社陣歡迎。那名秘書請求我帮助他操縱那般受英文教育者以便在工會下屆選舉時獲得控制權。我同意帮助他。爲了保証得到親社陣的那般受華文教育者的支持，我便和社陣主席接治和討論過那件事。我知道他喜歡安插他自己的人在工會里。他也看到排除當時的工會主席以及支持者的時機已經到來。同時社陣主席還規定一項條件說，必須讓他提出十七名候選人的十名，以便在工會選舉時被選爲工會的中央執行委員。我知道他的動機是什麽，也知道他意圖控制新加坡廠商工友聯合會，可是也沒有辦法，只好順從他的要求。我是同情那般受英文教育者，我要盡量使他們担任工會的職務。秘書起先不願意接收社陣主席的要求，後來也不得不順從，因爲他也知道除此以外，別無他法。社陣主席，王淸杉和另一名社陣職員和我討論了好幾次，其中有一次，我們聯合起草了一份要担任工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候選人的名單。我們那時的安排是這樣的：那名受英文教育的秘書和我在那般受英文教育者進行選舉運動，王淸杉和另一位社陣職員是在那些受華文教育者當中進行選舉運動。我們遵守協約，到各分會去促請會員選舉那些社陣主席和我共同起草的候選人。我們到各分會去的時候，分發選舉會的名單，叫會員選舉人單上的人，工會選舉時，會員把所有名單上的候選人全部選出來。當時工會主席和支持者因爲反對社陣主席，全部落選。在這一次的選舉中，會員所選出來的候選人是他們在選舉前沒見過面或沒聽說過的人。

10，換句話說，選舉結果是工會落在親社陣人士手中，而那些受英文教育者便失去了在工會里的勢力？這麽一來，工會的效力有沒有改善呢？

答：雖然我們成功地使那般受英文教育者担任職務，可是工會的控制權還是落在親社陣份子手中。被選出來的十六名候選人，有九名是親社陣的，只有七名是受英文教育者。選舉結果對工會事務毫無改善。後來秘書向我訴說：那些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親社陣受華文教育者沒有爲了工會的一般利益來做事。他們的活動是不負責任的，常常沒有和工會里受英文教育者的職員磋商。於是工會里親社陣者和受英文教育者的關係逐漸惡化。中央執行委員會里佔少數的受英文教育者都感到不信任和不滿。結果秘書便由於這個緣故，提出辭職和放棄秘書職位。

11，你是怎麽認識社陣主席的？你又不是社陣職員？

答：我和社陣主席的關係是從一九六四年開始的。他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來我家看我，這是在我被釋放後大約一個星期。那時，我也不知道他爲什麽來看我，因爲先前我並沒有和他有什麽關係。他來看我是友善的。問了我的健康之後，他告訴我說，如果需要他帮忙可以去找他。第一次見面我們沒有談到政治，以後就有了。他常常鼓勵我閱讀各種與共的的物。

12，你是怎麽樣牽涉到新加坡敗調工友聯合會的事件呢？你被釋放時，不是有麽很制不能參加職工會活動的嗎？

答：是的，我被釋放時是有之我閒不能參加工會活動。在一九六四年五月我被釋放時，我以前的同僚，當時是新加坡敗調工友聯合會的職員，他們來看我。有一次他們來找我去協助工會的活動。因爲以前我和他們有聯緊，所以很難拒絕，並答應做他們的工會顧問，我充份了解，在工會事務上担當重要任務是違反我被釋放時的跟[illegible]介。就是爲了這個理由，我担任工會顧問是嚴守秘密的。

13，你參加職工會，本來是要爲工人尋求公平待遇，肥遊，對於政治滲透工會這一點，你的反應是怎麽樣呢？

答：政治滲透工會是很危險的事。如果工會事務被政治操縱，好像隨便號召罷工來掀起對政府的不滿，就不能協助改善工友的工作情況，而只能給工人帶來更多的困難。過了不久，政治變成比職工會事務更重要。職工領袖如果不警惕和不對身於他們的工作，才有政治滲透工會的可能。他們的治談的度只能招我共產私親共份子的撓被。

15，最後，胡先生，你已經結了婚，而且是有了家庭，被釋放後，謀生對你該是最重要的了，你能告訴我們你將來的計劃嗎？

答：我知道扣留犯被釋放後要找工作是很難的，除非他有特殊的技能，還是因爲職位少的緣故。我再一次和第二次我釋以後也遇到同樣的困難，我現在已經決定從強了。